

难以忘怀的珍贵记忆——谢希德校长与美研中心(上)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成立于1985年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迎来了四十华诞。

尽管我实际只参与了美研中心的筹建和中心成立后最初一段时间的工作,但经历的许多事已成为我日后人生和事业的宝贵印记。

关乎大局,谢校长亲任美研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从开始规划的第一天起,每一个规划和实施,每一个进步与成就,都与谢希德的名字连在一起。

中美建交之后,两国的关系迅速升温,双边的经贸、投资、教育、文化等交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各种历史和现实的问题与挑战也时而剧烈,时而和缓地助推或阻碍着中美关系的发展。

当里根在作为第一位美国总统非常成功地访问了一所中国的大学——复旦大学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关注,到访复旦的外宾几乎以几何级数般地增长。特别是在美国熟悉了解或听闻谢校长的新老朋友,都满怀敬意和交流的热情到访复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双方对推动和发展中美交流与合作的热情和势头。

谢校长清醒地看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看到了在中美关系快速发展中,中美之间存在着这么多研究与交流的落差缺失、这么多认知和理解的误区偏见;看到了双方都需要加强交流,需要增进了解,都需要信息、需要研究、需要人才;看到了复旦大学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担负的责任。在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深思熟虑,谢校长提出了要在复旦建设一个跨学科、跨领域,担负学科建设、项目研究、交流合作和决策咨询四大功能,能代表一流大学核心学术水平的美国研究中心!

谢校长的方案很快得到校党委书记林克、汪道涵市长和国家教委(原教育部)的赞同和支持。此间我有机会旁听过几次谢校长向汪市长汇报关于筹建美研中心的设想,清楚地记得汪市长高度肯定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判断,多次说:中美关系将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中中之重,并提出复旦要建设一个一流的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希望复旦要急国家在信息、研究、决策和人才培养方面的需求之所急,要在国家的发展大局中发挥作用。

这些高瞻远瞩的谋划和战略性的定位,对建设一个什么



■ 1990年,周明伟陪同汪道涵先生和谢希德校长出席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一期工程开工典礼

样的研究中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当时每一个细小方案的实施,都是谈何容易!当时参与筹备的老师们都非常清楚中美关系是如此复杂、敏感,它的政治性政策性是如此之强,它的风险责任是如此之大,谁能来驾驭?加上研究美国本身跨学科、跨领域、跨语言、跨国界的属性,特别是正处在百业待兴的复旦,校财务部的账本上几乎没有多余的预算能用于美国研究中心的建设……大家心里有关筹建中心的一长串问题,基本归结为:钱从哪里来?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谁来担当美研中心主任这一重任?谢校长以坚定而沉着的语气告诉汪市长:“我已向国家教委和校党委报告,将担任美研中心主任一职,至少在初创阶段。”

此时的谢希德,是一名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是一名中科院院士、新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创始人之一,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女校长和期后不久的上海市政协主席,她婉辞了一个又一个担任各类知名耀眼职务的邀请,却主动担当了美研中心主任一职。

这大概是谢校长一生中,唯一一个自己要求担任的职务。

每个参加美研中心筹备工作老师,都从谢校长这“众望所归”的决定和坚定沉着的语气中感受并汲取到强大的克服困难、实现目标的动力和信心。按照谢校长的要求:整个筹备工作不设一名专职人员,大家都兼职工作;整个中心的建设工程争取不用学校一分钱的预算,以全新的思路到海外筹集资金!

我很幸运地在自己事业发展起始的时期,就见证并参与了这个满视野困难又充满激情奋力拼搏的过程。而最早见证的,是一份份请求项目审批的

报告和一个个几经扯皮往返才能获得的批复印章。规划、拆迁、给排水、供配电,各个规划设计的可行与调整,各种建筑材料和施工质量的监控……甚至要为一根能打国际长途的电话专线,花上一、二十次的交涉,等上大半年的时间……但整个筹备工作在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着。

其中能够载入史册,肯定是前无古人,大概也难有来者的记录,是谢校长亲自组织启动了一个由外国友人组成的团队在海外为复旦建设美研中心的项目募集资金——为教育筹款在海外司空见惯,但在当时许多人还是闻所未闻。筹款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谢校长的“铁粉”,都深深地了解中美关系的重要,都了解钦佩谢校长的为人和她心目中对美研中心的期许,他们制定了一个难以想象的筹款目标,更难以想象的努力,实现了这个目标!

“尽快让美研中心运转起来”:如何举办国际会议的国际会议

谢校长当时高瞻远瞩的一个重要决定,是不能等到筹款目标实现才开工,要尽力做到“筹到多少钱就先办多少事”,要让捐资方尽快看到捐款效果。于是决定先将校外办所在“小白楼”以最快的速度建成美研中心的雏形。谢校长当时就明确要求,一是“小白楼”要最大限度地压缩办公用房的空间,将最好、最大的空间,留给能举办国际会议和各类研讨会的会议设施,二是要建设一个供美国问题学习研究的最好的资料室。当时“小白楼”的资料室是全校唯一装有空调的资料室,谢校长还专门将校图书馆副馆长吕慧芳调到美研中心资料室负责资料室的建设,这样的“高配”在校园里也是不多

见的;三是要为美研中心配备尽可能先进、当时校园里还鲜有的电脑、电传机(Telex Machine)、复印机、传真机、投影仪和电动打字机。谢校长还让来访的外国朋友——但凡可能,为美研中心买一些最新的电脑软件,并辅导我们使用这些软件。在当时中国还没法使用E-mail的时候,谢校长就请他们给我们讲原理和使用的方法。

但谢校长脑子里想的,是如何让美研中心尽快地运转起来。

八十年代的复旦,绝大多数的学者大都还没有对外交流学习的机会和经历。谢校长认为,对外交流效益最好的办法,是用举办国际研讨会的方式,把杰出的外国专家学者请进来,这样可以最大范围地让国内的学者面对面地同他们交流学习,了解国外专业发展的最新动向,缩小同外部世界的差距,有效建立同国外同行的交流关系,花小钱办大事。但如何举办国际会议,当时大都是五花八门、各行其道,不太符合国际通行规范,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谢校长就向国家教委建议,筹备召开一个“如何举办国际会议的国际会议”,国内各有关单位的学科带头人及相关会务工作者参加,由谢校长出面邀请她熟悉的国际知名国际会议/论坛的组织者和专业人员来中国讲课、研讨,帮助我们培训相关的工作人员,解决在中国举办各类国际会议的特殊问题。这是一个多么闻所未闻、但每个参会者都明白其意义的会议啊!而外方参会者都被会议组织方虚心向国际同行学习的诚意所感动,所有的国际旅费和在华的食宿费全部自理……

我和校外办的多位同事都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筹备、组织和报告、研讨的全过程,分工负责学习国际会议如何作议题策划、议程设计、论文征集和遴选、重要嘉宾邀请、会标设计与制作、文件及会议翻译、会务食宿安排……等等。谢校长专门要求会议要落实几件事:要花钱租借设备搞同声传译、要添置一些咖啡具来安排茶歇(Coffee Break)、要准备好现场使用的投影仪和幻灯机、要用(发言)限时提醒器……在现在看来,所有这些会务设备和安排都是小菜一碟、完全不足挂齿的事,但在当时常常可能轻而易举地难倒你一个团队。

中外双方对这次会议成功的高度评价,使得“小白楼”和美研中心名声大振。汪熙先生

随即提出,由他负责联系美国的知名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与美研中心联合召开一个美方高度关注的有关中国改革开放议题的研讨会,得到了谢校长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很快,作为美研中心成立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学术会议——“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与前景”成功召开了。被美方学者誉为“第一个由一所中国的大学和一个美国智库联合举办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会”。这个会议的所有会议发言和会议文件、正式出版物至今都被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1990年初,美研中心建设项目的出资方通知,将派专业审计到复旦,对已使用的款项进行审计。学校基建处和财务处立刻按要求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多位朋友都提醒我们:这可能是一次中方没有经历过的最严格的审计。谢校长把接待安排这位审计N先生的任务交给了我。出乎意料的是,在机场接到N先生时,他除了同与我去机场接机的基建财务的同事确认审计项目清单、审计要求和时间安排外,明确地婉拒了几乎所有接待安排,包括食宿、用车、宴请、参观游览和其他礼节性的安排,所有涉及费用全部自理……在整个四天的审计过程中,N先生除了板着脸要求补充和更正相关数据材料、通过翻译同相关人员谈话外,完全是心无旁骛一天12小时的工作。在按计划第五天离开中国时,除了依然板着脸留下了一张长长的清单,要求中方尽快以传真方式补充有关数据与说明,其中包括要求学校说明美研中心设施使用情况的列表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客套和评论。直到一个半月后,资助方给谢校长来信称,审计结果表明,第一期资助款项每一分钱的使用都物超所值(The use of every single penny is worthy than its face value)!我当时激动地将这句话抄录到自己的笔记本上。这也意味着美研中心的二期资助基本有保证了。

周明伟(曾任中国外文局局长,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1980年9月—1996年3月在复旦大学学习和工作,曾任复旦大学外事处副处长,校长助理兼校办主任、校外办主任。)

副刊投稿邮箱:
Fudan_media@fudan.
edu.cn